

ASSEMBLÉE NATIONALE CONSTITUANTE (1).

1 août — 3 novembre 1789. (Lett. pat.) = DÉCRET
régime féodal, des justices seigneuriales, des
des offices, des privilèges, des annates, de
ices, etc. (2). (B., I, 51.)

nationale détruit entièrement le régime féodal, et
droits et devoirs tant féodaux que censuels, ceux qui
te réelle ou personnelle et à la servitude person-
ésentent, sont abolis sans indemnité, et tous les au-
es, et que le prix et le mode du rachat seront fixés
e. Ceux desdits droits qui ne sont point supprimés par
néanmoins à être perçus jusqu'au remboursement.

La grande peur de 1789

sié, dès le mois de novembre 1787, la volonté de convoquer les
nt ouverts que le 5 mai 1789.

urent prises pour parvenir à cette convocation : nous ci-
d'état du roi qui prescrit des recherches dans les
on des états des provinces, et un autre a
une assemblée des notables.

e aussitôt après l'ouverture des états. Les députés des ordres
oulurent vérifier séparément leurs pouvoirs, et résistèrent
i furent faites et aux mesures qui furent prises pour parve-
nir, les députés des communes résolurent de se constituer en
tèrent dans la séance du 17 juin 1789 : leur décision est le
tés des ordres privilégiés ne se réunirent que le 27 du même
roi du 23 juin.

1789年大恐慌 法国大革命前夜的谣言、恐慌和反叛

谣言如何在民众、贵族、王室之间制造了裂痕，使得人人自危，并迫使各自拿起武器指向对方？

Georges Lefebvre
[法] 乔治·勒费弗尔 著

周思成 译 高毅 审校

之道译丛

·06·

Georges Lefebvre


[法] 乔治·勒费弗尔 著

周思成 译 高毅 审校

La grande peur de 1789

1789 年大恐慌

法国大革命前夜的谣言、恐慌和反叛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789年大恐慌 / (法) 乔治·勒费弗尔著 ; 周思成译. — 太原 :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9.7
ISBN 978-7-203-10988-4

I. ①1… II. ①乔… ②周… III. ①法国大革命—研究 IV. ①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40346号

1789 年大恐慌

著 者: (法) 乔治·勒费弗尔

译 者: 周思成

责任编辑: 王新斐

复 审: 贾 娟

终 审: 李广洁

出版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天猫官网: <http://sxrmebs.tmall.com> 电话: 0351-4922159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63.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厂: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5mm×965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7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10988-4

定 价: 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译序

一本能告诉你法国大革命究竟是什么的小书

高毅

乔治·勒费弗尔的《1789年大恐慌》这本书，我20世纪80年代读博时看过，受益不浅。现在重读，又有了一些新的体会。

先前读它，是出于对当时西方正在兴起的法国革命“心态史”的兴趣：因为勒费弗尔这本书中有很多相关的内容。所谓“心态史”，是一种注重探索历史事件背后的集体心理或大众文化因素的史学，它本属于年鉴学派内在的学术传统，而它之所以能在法国革命史学界走红，则主要是因为它有助于打破这个学界只认“社会-经济分析”的传统研究模式，既能丰富历史阐释的手段，又能让大革命史学增加一些它本就应该有、但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被不恰当地淡化了的人文色彩。这个路子看来是走对了，后来国际史学界经久不衰、至今风头仍健的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研究热，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无疑是一次了不起的史学革新，而勒费弗尔在其中的先驱作用也早就为史界所公认，原因就是他在1932年推出的这部“大恐慌”综合研究，首次尝试了社会经济、时事政治和集体心理诸要素的有机结合，视角独到，分析精彩，几乎就是勃兴于20世纪末的心态史学新潮的一次

预演。

不过勒氏这本《大恐慌》的意义恐怕还远不止于此——这是我最近在校阅这本书的中文译稿时产生的一个强烈的感觉，当然这种感觉的触发也和我多年来在法国大革命问题上的种种见闻和思考有关。

有心人会注意到，这些年来总能听到一些诋毁“革命”的声音，大体意思是说，像法国大革命这种靠发动群众进行的革命全然是错误的，根本就不应该发生，因为它只能带来无穷的灾难。伴随着这种诋毁的，还常常有对英美式精英改良路线的各种追捧，直至把它说成人类进步的不二法门。这当然是一种缺乏历史常识的偏激之论，传播它的也多是一些自媒体，而严肃的专业历史学家一般都不屑于去理会，实际上它也不值一驳。但问题是，在新保守主义思潮甚嚣尘上而那些低品质的自媒体又极其活跃的当下，如果专业历史学家完全不介入，听任谬种流传，后果恐怕也有些堪忧：因为“法国大革命”这件事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史学问题，它与当今世界的政治现实息息相关，尤其是那些诅咒大革命的人往往还打着“道德”“自由”“人权”等漂亮旗号。所以有良知的专业历史学家还是应该有所行动，主要是应该设法多向公众传达一些有关大革命史学的科学信息，包括通过出版社多推介一些好书，譬如我们面前的这本《1789年大恐慌》。

我感到《大恐慌》这本书似乎特别有助于今天的公众正确认识法国大革命。究其理由，大概有如下几点。首先，它能让读者深切感知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必然性，而一旦有了这种感知，那就不难明辨上述那种“革命否定论”的庸俗和虚妄了。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没错，法国大革命确实是靠发动群众来进行的，那是一场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全民动员”的革命，所以它才能不同于英美革命而习惯地被人们称作“大革命”。而如果没有“大恐慌”，法国革命能不能“大”起来呢？显然是不能的，因为“大恐慌”所体现的，其实就是革命时

代法国占人口 80% 的农民的总动员，而且这种农民的总动员还几乎同时促发了许多城镇的国民卫队组建，实际上推动了法国市民的总动员，于是全民动员完成。可是，这些法国农民又是怎么被动员起来的呢？是某个政治领袖或党派刻意策划、主动实施的吗？当时的人们也确实有过这种怀疑，有的说是贵族在搞阴谋诡计，有的说是资产阶级在玩鬼蜮伎俩，显见是两大正激烈较量着的政治势力在相互甩锅，虽然全都不靠谱，不过倒也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革命派的精英层至此都还没有洞悉“大恐慌”的实质内涵。这些“城里人”虽然也渴望革命，有些甚至还有做领袖的野心，但此时终究谁都不曾动过一丝全民动员的念头，当然谁也不可能有这种能力。事实上他们还觉得农民的这种发动很碍事，甚至很危险，所以在“大恐慌”期间和随后的几个月里，全国各城镇的大资产阶级都曾不惜和特权等级联手，血腥镇压过起义农民——不过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一暴行立刻普遍引起下层市民的强烈抗议，进一步促成了他们的政治觉醒。

那么，究竟是什么引发了“大恐慌”？迄今能在综合的层面上把这个问题说透的，看来还只有勒费弗尔的这本书。它告诉我们，这一事变的发生，其实缘于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偶然纠集，其中，有天灾、王朝战争、政府决策失误招致的国民生计危机的严重恶化，有众多疑似盗匪的饥民和失业者流浪团伙的四下流窜，有粮食骚动和抗税、反领主等种种反叛活动的此伏彼起，有首都三级会议政情的危象丛生，有国内军队的可疑调动和外国军队的陈兵边境，还有关于流匪、雇佣军和外国武装数百年侵扰的历史记忆，有农民对领主压迫的千年积怨，等等等等。总之一切都表明，中世纪以来一步步积聚起来的法国社会矛盾，这时已经抵近了总爆发的临界点。这种情况下，法国农村的气氛自然非常紧张，人人如惊弓之鸟，有关匪患爆发和“贵族雇人烧毁庄稼饿死平民”的各种恐怖流言开始不脛而

走。广大小农本来就度日艰难，现在更是人心惶惶，而出于求生自保的人性本能，他们很快就以村庄或教区为单位匆匆组织了起来，并拿起了武器，而这种农民武装在一些地方很快也就发展成了一支支攻向领主城堡的革命军，实际上就此形成了一股将对大革命进程发生真正决定性影响的民众力量。据说一些地方的基层领导也曾呼吁和敦促过村民的这种自我武装，但这似乎仍改变不了这种大规模农民发动总体上的自发性质。于是，读者这时也就能大体明白了：原来法国大革命的“大”，远非政治精英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法国这种大陆国家阶级分化的历史比较悠久，因而强势阶级也就是反民主的特权贵族势力异常根深蒂固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使然；所以，在法国以及欧亚大陆其他历史悠久的国家发生的革命，也从来就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问题，那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这样一来，人们对英美的革命为什么会比较“小”（实际上相对于法国革命而言那可能只属于某种改良）也就能有所理解了，因为英国阶级分化的历史严格说来只是从1066年诺曼征服才开始的，而美国呢，则更无需多说。其实，应该说前现代历史短一些的国家的确拥有某种特殊的优势，起码它们的现代转型要少很多磨难，它们的“温和革命”也的确与政治精英的自主选择有较大的关系，但那能成为我们抱怨和责备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没走英美路线的理由吗？历史学不认可这种偏狭。

勒氏这本书之所以值得特别推介的第二个理由，是它展示了“革命群众”的本来样貌。法国大革命中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全民动员”，自然也就引出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群众现象”，而这一现象也的确与法国大革命的那种常常显得非常过激的暴力色彩，与共和二年的“大恐怖”有显见的关联。正因如此，“革命群众”——这个由法国学者勒庞^[1]

[1] 《群体心理学》(*Psychologie des foules*, 中文版书名《乌合之众》)的作者。

首次提出的命题，也就很自然地成了世人对法国大革命的不同看法的核心分歧点。承认法国大革命及一切类似革命的历史正当性的人，如勒费弗尔，都能对“革命群众”或热情赞美，或至少抱持某种“同情的理解”，而诅咒革命的人则无不痛恨“革命群众”，说他们是“凶狠的野蛮人、残暴的杀人犯”（伯克），是“走私犯、偷猎者、流浪汉、乞丐、惯犯”等“社会渣滓”（泰纳）。勒庞虽然并不认为“革命群众”的暴行是严格意义上的犯罪，但他仍把“革命群众”的出现归咎于非理性的雅各宾党人对传统社会结构的破坏，认为是这种破坏把人变成了狼。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那些敌视“革命群众”的人都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也就是希望全世界都能走英美路线的人。所以对“革命群众”的这两种不同态度，实际反映的还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平等主义和自由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一对对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左右对峙，是法兰西政治文化与盎格鲁-撒克逊政治文化之间的传统对立。这些观念性的东西之间当然并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实际情况是各有各的存在理由，相互之间也应该互补共融，但讨论历史问题时，最首要的还是要注重史实。勒费弗尔对“大恐慌”时期“革命群众”的描绘和分析，就堪称注重史实的典范，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这些“革命群众”的出现并非对传统社会结构的“人为破坏”所致，因为根本就没有谁策划或操纵过“大恐慌”；其次，“大恐慌”事件的参与者看来并没有多少泰纳所说的那种“嗜血和兽性的恶棍”——武装起来的村民们，无论是警戒、巡逻和盘查行人，还是驰援附近城镇或攻打领主城堡，都表现得相当克制；尽管事件几乎席卷了全国，领主城堡和封建文契也烧了不少，但杀人案查来查去也只有区区三起。如此看来，非理性的残暴实非“革命群众”的天然属性。当然，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勒费弗尔这里所介绍的“大恐慌”时期这种相当温和的“革命群众”，远非大

革命时代“革命群众”的全部。事实上，随着大革命的激进化，“革命群众”也变得越来越暴烈了，直至变成1792年“九月屠杀”中的那群令人发指的杀人狂魔。饶是如此，说“革命群众”天性残忍仍然是一种罔顾事实的偏见，因为大革命中所有那些极端形态的“革命群众”其实都是在极端危急的形势下出现的，或者说把“革命群众”中的人变成了狼的，根本上还是大革命所面临的那种极端强大而凶悍的国内外反动势力。大陆主要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一般就是这么难，奈何？“大恐慌”时期的“革命群众”之所以比较温良，无非是因为大革命才刚刚起步，各种矛盾还没有充分激化的缘故。勒费弗尔没有论及后来的变化，只简单说了说1790—1793年间研究尚不充分的恐慌复发情况，并断言：“只要革命处于危急之中，恐慌就会持续不断。”也许，有关大革命上升过程中民众恐慌现象演进的深入探讨，有可能在“大恐慌”和“大恐怖”之间建立某种关联，从而为“大恐怖”的成因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开出一条新路？我们拭目以待。

20世纪20年代末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创立年鉴学派的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同时也有过创立心态史学的努力，分别写出了《国王神迹》（1924）和《拉伯雷的宗教》（1942）这两部心态史名著。勒费弗尔写《大恐慌》时也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与他们过从甚密。虽然勒氏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自己不同的学术路数，但费弗尔和布洛赫仍极重视他的研究，都为《大恐慌》写过书评。其中布洛赫说的一些话，我觉得别有深意。他说：“大恐慌”因其主要起因即“匪患”的虚幻性，从来不为史家所重视，大家一般只把它看作大革命时期一个搞笑的插曲，觉得研究它远不如研究发生在巴黎街头的事情来得实在；而勒费弗尔却慧眼独具，看到了“大恐慌”这个“集体幻象”对当时法国社会状态的“征象”意义，那就是广大农民通过这一番瞎折腾，却也增强了团结感，并意识到了自己力

量的不简单，所以一旦“匪患”幻象烟消云散，他们就“自然而然地”敢于把抗争的矛头“转向自己身边的社会之敌：领主和他们的文契保管室，还有他们那些令人痛恨的权利”^[1]应该说，布洛赫这些评说的关键意思，正如其文章的题目所示，是“大恐慌”被勒费弗尔正确地看作了当时法国“社会状态”的“征象”。而当时法国的“社会状态”又是什么？不就是一场革命风暴正在降临么？马克思主义史学一贯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反封建”的阶级斗争，而勒费弗尔对这个观点是完全赞同的，同时他对“大恐慌”的基本定性也是法国农民反封建的总动员，那么，如果说他把“大恐慌”当作当时法国“社会状态”的“征象”来研究，其实也无非是把“大恐慌”看作了“大革命”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个案”。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勒氏这本书值得特别推介的第三个理由，那就是它有助于人们认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本质。

勒氏此书既是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典型个案研究，同时又是一部公认的经典，那么它所传递出的每一个理论信息，尽管有的看似并不很经意，却值得认真考量。就是本着这种态度，我注意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勒氏在高调肯定“大恐慌”的反封建意义的同时，也在时不时地强调另一个客观现象：“大恐慌”在有力地推动着“l'unité nationale”或“la solidarité nationale”——在法语里，这两个说法的意思大同小异，笼统地都可以被汉译为“民族团结”“国民团结”或“国家统一”，抑或是意思更详实的“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勒氏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常常有些随意：有时指的是第三等级的“阶级团结”——如在解释一些局部“匪警”何以会迅速传向四方时，勒氏说那是因为相信贵族正在利用盗匪对付第三等级的民众，

[1] 参见 Marc Bloch, *L'erreur collective de la 'Grande Peur' comme symptôme d'un état social*, in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T. 5, No. 21 (May 31, 1933), pp. 301-304

“自然要呼吁加强全民族的团结，加强城市和郊区之间已经初具雏形的联盟”（见本书第 159 页），有时指的是三个等级之间的“等级联合”——如勒氏称在普遍发生的乡民武装驰援城镇的行动中，可以看出“民族统一有了很大进展，因为本堂神甫和领主常常走在队伍的前列”（见本书第 173 页），但他最强调的还是这一概念的“反贵族”内涵——如他在书的结尾处这样总结：“恐慌立即引起了激烈的反应，在其中，大革命的好战激情第一次展现出来，民族团结也获得了自我表现和巩固的良机。此外，这种反应——尤其在乡村地区——转而反对贵族。”（见本书第 234 页）。但尽管如此，从勒氏行文中对“民族的”（national）这个字眼的这种反复提及，我们还是能感到，他在强调“大恐慌”（实际上也是“大革命”本身）的“反封建”特性的同时，另一个问题总在他心头挥之不去，那就是那个时代对于“民族国家”问题有一种特殊浓烈的关怀。

其实，“nation”这个词（它有汉语的“民族”“国家”“国民”“民族国家”等多重含义），从来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第一关键词。不过我们要知道，这个词当时除了自己的本义之外，还带有强烈的“人民主权”或“民主”的时代意涵。“国王万岁（Vive le Roi）”和“民族万岁（Vive la Nation）”是革命之初反映政治态度对立的两个标志性口号。当西耶斯喊出“第三等级就是整个民族”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在宣示，法国革命的核心任务是要以民权取代王权，要对法兰西民族国家实施民主化改造。但在 18 世纪人们的心目中，民主化这东西始终只是个手段，远非目的。那么什么是目的？按照卢梭和康德的意思，欧洲各民族国家之所以需要民主化，那是因为只有在欧洲各国都实现了民主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欧洲联邦”，而只有在欧洲联邦稳固确立之后，欧洲才会享有“永久和平”——目的，就在这里。而且我们也知道，18 世纪法国和欧洲的启蒙哲人都有很强的世

界主义情怀，所以他们对民主化的鼓吹，显然还有更宏伟的世界性目标，最终目的无非是实现永久的世界和平。

也许有人会讥之“乌托邦”，但这个世界不能没有这种乌托邦，也注定会有无数为之舍身奋斗的仁人志士。法国革命者其实就是第一批这样的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于是法国大革命就被成就为了这种“乌托邦实践”的伟大开端。其实在法国革命之前发生的英美革命本质上也是无悖于这种“乌托邦理想”的，只是特定的地缘政治条件（或孤悬海外，或远隔大洋）和社会历史条件（没有足够的倒逼压力），没有让它们做成这个注定将演成世界性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运动的开端。当然法国大革命的路走得也极艰难，迟至19世纪末叶才勉强完成法国自身的政治民主化，而且这个好不容易才初步建成的现代法兰西以后还会跌跌撞撞地走许多弯路。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显然也是这种“乌托邦实践”的继续，或者说大革命事业的继续，它有过一些可喜的发展，但现在看来仍困难重重。不过无论如何，法国大革命终究是开创了一个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的历史伟业，事实上它也留下了许多极其重要的相关遗产，其中，“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已经深入全球人心的“三词箴言”，还有那一套把爱国民主情感和国际主义胸怀融为一体的“政治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不仅时时在调正法国人处理国内和国际政治事务的步态，而且似乎还能长期成为整个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运动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

至此，我们大概就能有所感悟：原来法国大革命除了传统史学一贯强调的反封建意义之外，还有启动了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世界潮流这一层意义，而且这层意义似乎还更加深刻一些，更能代表大革命的历史本质。

写于大革命230周年之际

序一

谭旋 (Timothy Tackett) *

1789年7月和8月初，一股异乎寻常的恐慌蔓延整个法国，几乎无与伦比地展示了谣言的力量及其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冲击。短短两星期内，在三分之二的法国领土上，一座座城镇和村庄相继沦陷，只因害怕“盗匪”来袭。据说，这群盗匪在乡间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恐惧的胁迫下，大批村社居民纷纷逃离家园，藏身近旁的树丛和森林。或者，他们匆匆纠集起来，在城镇外围拦起路障，试图抵御歹徒的袭击。在恐慌期间，最令人惊讶的事实莫过于——那些令人战栗的“盗匪”实际上从不存在。

显然，在人类历史上，类似的恐慌事件并不鲜见。例如，15和16世纪西欧发生的可怕的巫术恐慌，还有1940年6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军队合围巴黎之际发生的大逃亡。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类似案例。18世纪“叫魂妖术”引发的恐慌，以及1900年义和团运动造成的普遍恐慌只是其中两例。但是，1789年的“大恐慌”尤为引人注目，原因首先在于恐慌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其

* 法国大革命政治文化史专家，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荣休教授。著有《暴力与反暴力：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一书。

次在于它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事实上，国民议会竭力平息乡村的骚乱，这对它在1789年8月4日颁布的一系列法令产生了深刻影响，正是这些法令废除了封建特权，摧毁了旧制度的主要社会政治结构。

这部关于“大恐慌”的著作，作者是乔治·勒费弗尔，堪称20世纪研究法国大革命史独一无二的大家。他的父亲于1874年出生在法比边境的工业城市里尔，是一家贸易公司的会计员，他的祖父是一名朴实的纺织工。由于家世寒微，勒费弗尔只能通过助学金继续学业，没有能力去巴黎求学。这也导致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巴黎的知识精英圈子才勉强接受了他。勒费弗尔在里尔大学完成了学业，他最初的兴趣是英国中世纪史，似乎是在1899年获得学位并服完义务兵役之后，才转向法国大革命研究的。多年后，勒费弗尔回忆说，造成这一“转变”最重要的因素，是他邂逅了伟大的政治领袖和政治活动家让·饶勒斯（Jean Jaurès）撰写的多卷本《社会主义法国大革命史》（*Histoire socialist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尽管二人从未私下晤面，勒费弗尔也只远远望见过饶勒斯两次（在众多听众当中聆听他的演说），但勒费弗尔总是将饶勒斯当作自己最重要的“导师”。事实上，勒费弗尔自青年时代开始，就受到了茹尔·盖得（Jules Guesde）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盖得是里尔在国民议会的议员。但是，饶勒斯的马克思主义不那么教条化，似乎特别吸引勒费弗尔。他还加入了饶勒斯1905年创建的法国社会党，终生保持党员身份。通过早年的阅读和政治活动，勒费弗尔对卡尔·马克思提出的阶级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深信不疑。然而，终其一生，这种信念与他在大学学到并服膺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历史方法之间，始终保持着奇特而复杂的张力。他是一位求知欲极强而心细如发的学者，一贯提倡绵密的考据，并且身体力行，近乎痴迷。他曾经写道：“无考据则

无史。”他在笛卡尔的《方法论》中寻找灵感，同时也钻研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对某些苏联历史学家“混淆史学和宣传”，从来冷眼以对。

受到饶勒斯“自下而上的历史”的启发，勒费弗尔开始撰写长篇博士论文，以法国大革命前夕和大革命时期里尔附近地区（诺尔省）的农民为研究对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迫使他不得不推迟论文的写作。因为，在德军入侵和占领里尔期间，他不得不丢下自己的研究札记，又不得不在地方志愿军中服役一段时间（尽管他当时年过40）。不过，大战结束后，他寻回了丢失的札记，最终在1924年完成了论文，这项研究是法国史上最卓越和最有影响力的博士论文之一。勒费弗尔不仅开农民研究的风气之先，而且探索了许多社会史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后来由著名的年鉴学派大力弘扬。该学派以20世纪中叶极富影响力的刊物《经济与社会史年鉴》而得名。勒费弗尔的博士论文是一项庞大的地方性乡村人口研究，采用了多层次的分析：首先是地理学，其次是社会—经济“结构”和土地占有模式，再次是农业实践和农民生活的“文化”，最后是法国大革命的“事件”，包括大革命给农民社会带来的结构与文化的转变。自始至终，论文中的分析有广泛的统计数据支撑，并且均通过烦琐的人工计算获得。在这篇论文中，作者不曾把农民描绘成无知的牲畜（许多历史学家历来如此），而是将他们表现为自身命运的理性参与者，尽管他们不时受到强大的恐惧和情感的影响。

在索邦大学完成答辩之后，勒费弗尔已年届50，终于得以从中学教学脱身，荣任大学教授：最初是在法国中部小城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接着获得斯特拉斯堡大学的重要教职。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8年，是勒费弗尔学术生涯中最富于创造力和最多产的岁月。他先后迅速完成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第一篇综论，一项关于

1793—1794年“恐怖统治”时期农业问题的研究，以及关于拿破仑时代的长篇概论。但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应属他对大恐慌的研究，首次发表于1932年。勒费弗尔的新史学方法，还有他对民众集体心态的兴趣，可能受到斯特拉斯堡大学两位杰出同事的影响——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他们当时刚刚创立了开拓性的历史评论期刊《经济与社会史年鉴》。

1935年，61岁的勒费弗尔终于在巴黎获得教席。两年后，他接任索邦大学的法国大革命史的教席。时局风云激荡，大学乃至全法国都受到了政治对抗的波及。勒费弗尔热情地致力于反对法西斯主义，捍卫共和主义和民主价值观，他创建了“笛卡尔俱乐部”并出任主席，该团体由大学教师和中学教师组成，致力于促进对时事的理性发声。在1936年执政的左翼人民阵线政府的支持下，勒费弗尔还投身于1939年纪念法国大革命150周年的活动筹备。他参加了一系列相关主题的广播访谈，并担任《马赛曲》（*La Marseillaise*）一片的历史顾问，该片是让·雷诺阿（Jean Renoir）拍摄的大革命题材的著名电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勒费弗尔出版了极具影响力的关于法国大革命起源的著作《一七八九年》（*Quatre-Vingt-Neuf*）。在书中，勒费弗尔凸显了4个不同社会阶级的大革命体验：贵族、资产阶级、巴黎平民阶级和农民，以及这些体验如何彼此歧异和互相作用。此书长期以来是对大革命初期的主流解释，迄今仍被广泛参考。

对于勒费弗尔来说，二战年代是一段悲哀和惨淡的岁月。1940年法国战败的悲剧，加上他的妻子于1941年突然辞世，让他的境遇雪上加霜。此外，他的弟弟泰奥多尔（Théodore），也是普瓦捷的大学教授，遭到纳粹处决，而他的犹太好友马克·布洛赫和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同样遭到纳粹杀害——前者在里昂附近被杀，后者在德国集中营内丧生。但是，勒费弗尔仍在索邦大学坚

持教学，一直工作到远超正常的退休年龄，因为他担心，尽管自己大可全身而退，但德国占领军会趁机撤销法国大革命史的教席。他还着手编纂一份关于大革命起源的重要文献集，为一些研究生提供工作岗位，保护他们免于被征入纳粹的劳役工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勒费弗尔从大学退休。不过，他仍然致力于编辑《法国革命史年鉴》，并担任他创立于1937年的索邦大学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所所长。1946年，他发表了一项关于大革命末期（1795—1799）的督政府时期的研究。1951年，他出版了法国大革命时代综论的修订版。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多数时间他都住在巴黎南部工人小镇塞纳河畔布洛涅（Boulogne-sur-Seine）的一所小宅子里，这里成为吸引世界各地法国大革命史研究者的朝圣地。1959年，勒费弗尔在此辞世，享年85岁。

勒费弗尔在撰写关于法国北部农民的博士论文期间，深深为大恐慌这一历史现象吸引。正是在这一语境下，他开始质疑长期以来对大恐慌的主流解释，这种解释深受大革命时代的人自身对大革命的看法的影响。1789年7月，恐慌的报告从四面八方涌向巴黎和凡尔赛，仿佛暴力和动乱已经席卷全国。许多报告提到城镇和村庄正遭受袭击，同样可怕的是，刚刚成熟的庄稼正遭到焚毁。其他消息提到了入侵城堡和焚毁领主的文契档案。对于当时的法国民众而言，暴力和恐慌仿佛同时在各地爆发。因此，毫不奇怪，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恐慌是蓄意策划的阴谋引发的。除了贵族，还有谁会炮制出如此阴谋？他们在革命中失去了太多的权力，难免心生怨恨，自然渴望教训放肆的平民——如此推理下去——贵族必定会收买各地的罪犯、歹徒和“盗匪”来实施暴行。一旦接受这种解释，同时代的法国人转而相信关于“饥荒阴谋”的古老传说，在旧制度时期，这是对粮食短缺或面包价